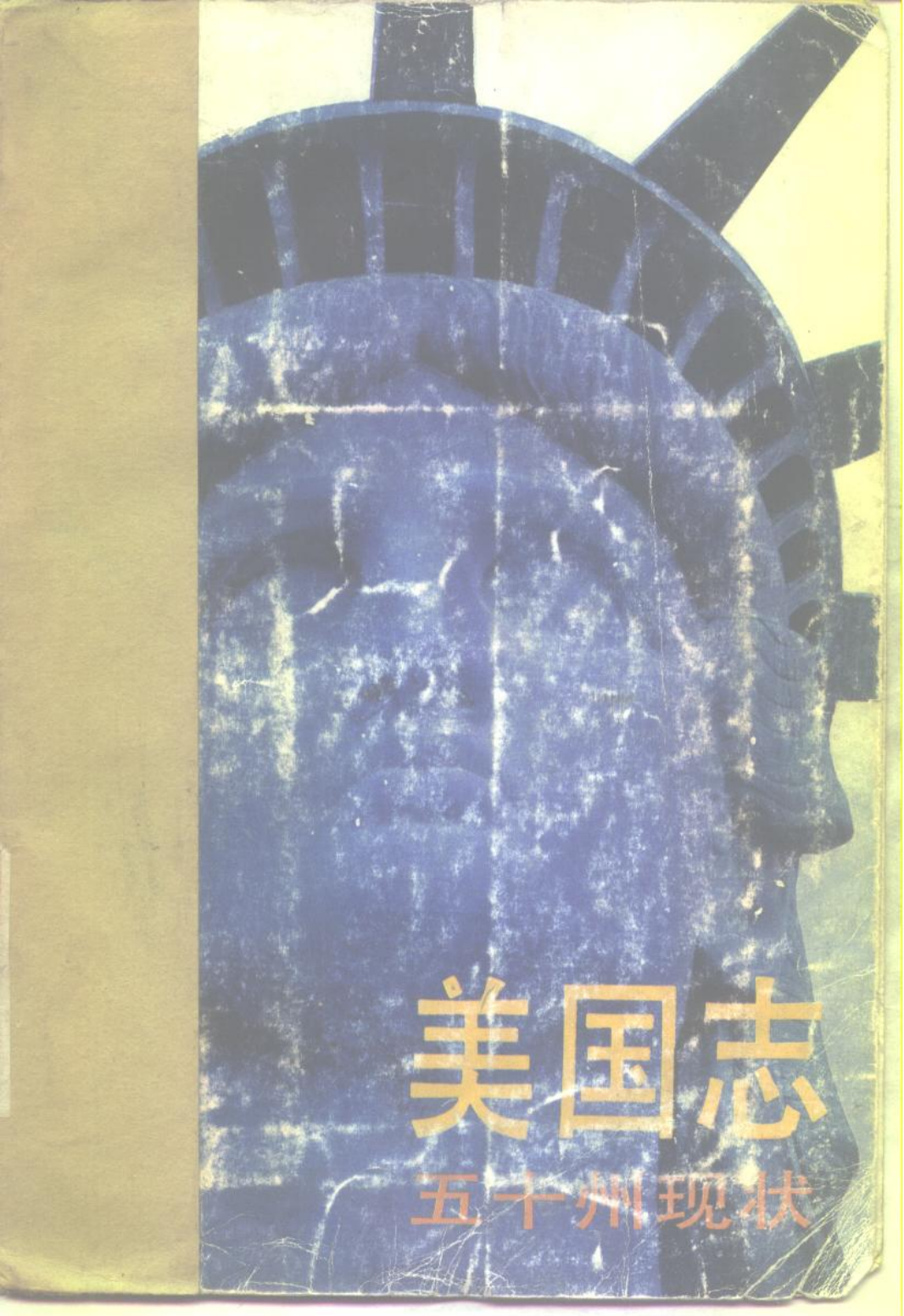




美国志

五十州现状

美国译丛

美国志——五十州现状 上

〔美〕尼尔·R·彼尔斯 杰里·哈格斯特洛姆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译室译 董乐山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18605

总 目 录

导言.....	1
中大西洋诸州.....	25
纽约 一、世界性的城市.....	27
二、仍然是帝国州吗?	58
新泽西 处在一个特大城市的阴影下.....	92
宾夕法尼亚 没落中仍有气派的州	113
特拉华 杜邦工业多样化的小州	148
马里兰 外来的文明	157
华盛顿, D.C. 世界性的首都, 被分隔的城市	175
新英格兰诸州	189
马萨诸塞 以多灾多难著称	191
康涅狄格 具有固定习惯的州	223
罗得岛 “城邦”和族裔实验室	238
佛蒙特 受人敬爱的州	246
新罕布什尔 宏伟的失望	257
缅因 潮流加速	267
大湖诸州	277
伊利诺 一、芝加哥: 湖畔大城	279
二、全州与下州	304
密歇根 一个工业巨人遇上艰难时世	318
威斯康星 传统、独立不羁派和修明政府	353

印第安纳 政客们的州	37
俄亥俄 中产阶级社会	398
交界的南部诸州	433
弗吉尼亚 老自治领长得年轻了	435
西弗吉尼亚 仍在奋斗挣扎之中	457
北卡罗来纳 最新的超级大州	471
田纳西 新老边疆	495
肯塔基 多样, 温和, 强暴	523
极南部诸州	547
佐治亚 南部的帝国州	549
南卡罗来纳 不再是一块化石	581
亚拉巴马 摇篮“摇”起来了	605
密西西比 终于有了希望	633
阿肯色 摆脱了乡气	665
路易斯安那 一个令人遐想的地方	684
佛罗里达 流亡者之州	717
大平原诸州	751
明尼苏达 成功的社会遇到挑战	753
北达科他 仍旧是孤寂的草原	773
南达科他 勉强变革的州	783
爱荷华 不同寻常的农业州	796
内布拉斯加 周期性的平民主义派	808
堪萨斯 黯然失色的州	818
密苏里 美国的缩影	829
俄克拉何马!	845
得克萨斯 永远繁荣的州?	865

山脉诸州	919
科罗拉多 一个悲剧正在形成	921
怀俄明 孤寂的地方	938
蒙大拿 粗犷的生态州	948
爱达荷 仍处在分裂状态	963
犹他 圣徒建立的州	973
内华达 沙漠上的罪恶渊藪	987
新墨西哥 民风纯朴?	1001
亚利桑那 绿洲文明	1019
太平洋诸州	1045
加利福尼亚 一、伟大的民族州	1047
二、海湾地区	1098
三、南部地方	1122
俄勒冈 害怕增长又谋求增长	1151
华盛顿 四季常青却令人迷惑	1171
阿拉斯加 伟大的土地觉醒了	1194
夏威夷 美国式的牧歌	1209
译后记	1232

导 言

把整个美国当作巨石一块来看——一种文化，一种公民，一个统一大市场——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这是美国生活中的一致化力量把我们带到这一步的。这种一致化的力量可以从标准化的电视到地区口音的消失，从全国性的银行业务到一个模式的假日旅馆和麦克唐纳快餐店的惊人相似这一切方面看出来。

本书却要唱一唱反调：不管大众传播手段的全国化和划一化的力量、政府和大公司的集中权力的全国化和划一化的力量是何等实际，美国五十州中的每一个州都仍是它自己的历史、人民、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的独特结合的产物，在美洲大陆上或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要尝一尝马萨诸塞州或得克萨斯州、佛蒙特州或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或俄勒冈州的生活的滋味，就需要到截然不同的地方去生活和活动。/为了要了解这五十个州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族裔* 和种族集团，工业、农业和大学，企业，劳工，艺术，新闻界的情况，我们到了每一个州，有的州还去了好几次。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想弄清楚究竟是些什么人、什么集团掌握着大权，什么力量在为那里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定调子。我们所寻求的始终是那些使某一个州（或某一个大城市或地区）不同于美国其余部分的独特个性的线索。/

* 族裔(ethnic)是美国社会学中近年来使用逐渐趋于频繁的一个名词，它指的—般是美国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和非新教徒欧裔移民的后代，尤指爱尔兰裔、意大利裔、犹太裔、斯拉夫裔等。它不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也不包括亚洲裔。有的报刊把它译为“少数民族”，但是由于美国只有多数种族(白人)和少数种族(黑人、印第安人等)，没有多数民族(盎格鲁-撒克逊裔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并不比其他族裔如德裔、爱尔兰裔多出多少)，因此把它译为“少数民族”是不妥的。——译注

本书就是我们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些面貌不同令人难以置信的各州所看到的情况的记录，尽可能做到坦率和忠实。

我们在精细地描述各州之前，不妨粗线条地来勾划几笔，作为背景介绍。我们发现这个国家使我们受到的鼓舞——即使在经济受到挫折的时候，即使在它的国际势力范围受到挑战的时候——不亚于使我们感到的敬畏。政治家们常常高声赞扬的“美国的伟大”不完全是虚构的神话。凡是喜欢究根追底的旅行者就会在美国的宏伟壮观、瞬息多变的大自然中发现这种伟大，在美国错综复杂的经济结构所涌现的力量中发现这种伟大，尤其是在美国族裔背景极其多样的人民中，在他们的奔放和新鲜的精神中，发现这种伟大。

后 联 邦 时 代

我们在结束五十个州的长途旅行的时候，察觉出美国人正在进行一个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他们已经把目光转到家门口，转到地方上，包括州和地方政府，来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人靠全国政府采取行动的信念已经大大地动摇了。不错，很少人怀疑过，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全国政府把美国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领导全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并且在全国迈出大步创建一个经济比较富裕、社会比较平等、教育比较普及、地位比较流动的社会方面，的确起了关键的作用。

由于通货膨胀、国际竞争加剧，又要为战后人数众多的“婴儿繁荣一代”解决就业问题，华盛顿的决策人弄得焦头烂额，他们发现无法保持充分就业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而大多数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过惯了这种生活水平。美国政府靠借钱，而不是靠增税来维持那灾祸深重的越南战争，因此通货膨胀似乎已无法解决。在八十年代初的全国严重衰退声中，它终于达到了一蹶不振的程度。

在社会政策方面，联邦政府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它所承揽的，不仅是一个规模空前的福利国家的帐单，从社会保险、食品券到老人和穷人的医疗，还有庞大的国防费用和越来越大的国债利息。一个“做好事”的国会使华盛顿插手于这样一些全然不同而完全属于地方的事，例如农村防火、联合用车示范、识字补习计划、切萨皮克湾海蜇控制等等。虽然在具体问题上——例如环境保护，或者维持社会保险——美国人仍信奉国家要起有力的作用，但是联邦的过问本身就已经使公众的耐心有不堪重负之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联邦的各项施政计划不论其用意是何等良苦，在一个幅员广大、极其多样化的国家里，能否都很好地适用到成千上万的不同地方。他们开始察觉到对自己的生活和地方上的共同福祉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使他们感到不安。罗纳德·里根总统是美国生活中后联邦新时代的象征，早在他出现之前，人们对国家的控制一切已经有了强烈的反应。

但是，如果美国人在八十年代要转向他们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担当起这个任务吗？州和地方能够在一种日益国际化的经济中起他们的重要作用吗？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经济中，资本、货物、劳务都是在全世界迅速流动的。基层政府现在会不会出来满足他们以前所不愿意满足的或者由于财力不够而不能满足的社会需要？当初就是因为这样才使联邦政府插手许多服务领域的。这些问题尽管尖锐，却没有现成答案。我们发现八十年代初期的州和地方政府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死气沉沉，有的进步，有的极为能干，有的平平庸庸，有的清白廉洁、一尘不染，有的贪污腐化，历史渊源根深蒂固。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代时期之中，美国的“全国政府以下的”政府不论在专业的能力或在扩大征税范围的能力等各方面，都有光年式的飞跃进步。而且正是在经济战略方面——也就是鼓励工业增长、开发象退休基金那样的新的资金来源、扶持小企业创业、打入新的

国际市场——从纽约到北卡罗来纳直至加利福尼亚的各州，正在大踏步地前进。

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好几个消极因素在起作用：银行业务趋于“全国化”的倾向吸走了游资，减少了地区性银行和地方银行手头的投资基金；全国规模的连锁商店和胃口贪得无厌的联合商场危及了小镇大街和甚至最会做生意的地方零售商的生意。同时，随着高技术的采用，发生了范围广泛的经济革命。由于生产线“机器人化”，基本制造业远迁海外，个人计算机改造了办公室的工作，整个整个的工业（因而也连带它们所在的整个地区）面临着大规模的变革。美国全部劳动力中制造业所占的百分比，在八十年代初是百分之二十二，预计到九十年代中要下降到百分之十不到。对于这样剧烈的经济前途的变化，我们看到各地区的反应很不相同，各地区视各自特有的传统而异。例如，高技术可以说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和马萨诸塞这些州里产生的，那是因为那里的高等学府孵育了它，然后它扩大到周围的几个州里去——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范围里就有新罕布什尔州。但是高技术也蔓延到纽约市的郊区、北卡罗来纳州、科罗拉多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明尼苏达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些地方都有一个杰出的理工学院，可以使专业人员能够跟得上专业的新发展，并且可以随时提供毕业生。其它有吸引力的因素是个人税率（当然最好是较低的）、学校办得好、文化修养高、自然环境保护好，这些都是靠州和地方官员来掌握的。为了使产品价格能够与其它国家的产品竞争，许多工业需要将生产线进行“机器人化”。而高技术极有希望生产几年以前几乎根本不知道的产品，因此各州对于公司选择厂址、大学课程和中小学课程的现代化，有着很大的影响。可惜的是，对于这种变化最顽固不化地进行抗拒的是中西部诸州。甚至在八十年代的萧条时期，那里的劳资双方的许多领袖人物仍然认为他们可以按原来老一套方式办事，可以不作根本的调整而恢复繁荣。

同时，由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婴儿繁荣”的一代发现他们向上晋升的阶梯被老一辈的人所阻塞，同代人的竞争又太激烈，全国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企业精神的新时期。这里再一次是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它们的调节和税收政策，根据它们鼓励当地金融机构扶植创造性和冒险精神的程度，能够对小企业的创业率发生重大影响的领域。

在社会方面，问题似乎是：如果华盛顿要大大地减少它原来起的作用，选民们是否会让他们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来承担？反对高税率和政府开支的情绪并不仅限于对全国政府这一级。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联邦开支膨胀所伴随而来的——有时是由此所促成的——州与地方预算的上升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情绪。多年以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全国经济中的成分成了日益扩大的一部分。第一响警钟是，1975年纽约市的财政困难无法解决，几乎濒于破产。纽约州长休·凯里当时说，这是个肯定的迹象，说明“美酒与鲜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接着在1978年在州和地方事务上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冲击浪潮：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限制性极严的百分之十三建议。这次表决并不是孤立的。在七十年代中，有二十三个州都通过了某种形式的预算限额或税率限额。马萨诸塞州1980年通过了严格的百分之二点五建议，这个州本来因为花钱一向大手大脚而有“捐税诸塞州”之称，而在这个州中大砍财产税，肯定地预示在八十年代纳税人的反叛还会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占优势只不过是中央一级认可了州与地方一级早已十分明显存在的削减开支的革命而已。

1982年国会和州长的选举使民主党人增加了一些力量。但是在八十年代，即使有一个民主党人当选总统，也不一定意味着政府机构会回复到战后数十年的大膨胀时期。

州、城市、州长、市长

在整个四十年代，美国联邦各州无一不是宪法过时、行政结构松散，州长常常不过是个挂名的首脑，州议会名额分配极不适当，没有内行的专业人才。接着，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当这种情况达到顶峰的时候，联邦法院颁布了出人意外的命令，强制实行“一人一票”代表权，结束几个世纪以来由乡村势力控制州政府的局面，进行“悄悄的革命”，以各州新宪法为中心，扩大州长权力，组织内阁式行政部们，州议会中配备内行的专业人才。到八十年代初，大多数州都有了极为内行的官僚机构。各州在财政上也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了。尽管发生了纳税人的反叛，几乎各州都通过了立法，对销售（或）个人收入实行基础广、效果大的税率。

权力也发生了转移：缅因州不再处在纸浆和造纸利益的股掌之上，蒙大拿州不再是阿那卡多那铜公司独家所有，佛罗里达州不再由一伙倒退的、心胸狭隘的“猪肉”帮农村州议员所控制，宾夕法尼亚州不再是受到美国钢铁公司和宾州铁路公司操纵的附庸。为了种植园主、纺织厂商、公用事业、银行的利益，控制南卡罗来纳州议会达三十年之久的低地农村州议员埃德加·布朗和所罗门·布拉特的“巴恩威尔帮”已不复存在。甚至长期以来殖民地化的西弗吉尼亚州也开始挣脱了采煤公司的完全控制。在大多数州里，权力开始分散在一些竞争激烈的私人游说集团、市镇利益集团和教师之间，在有些州里，则在环境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游说集团之间。某些州的反动的残余势力很难动摇。1982年，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拉尔夫·哈本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这样的话：

“穷人并不是活跃的选民。削减社会服务更加容易了。”同一年，密西西比州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办公立幼儿园，但是经费来源是提高销售税而不是对有势力的采矿业增税。

但是，八十年代新的政治趋向使得这种态度不可能不打折扣

地保持到八十年代结束。在各州的州议会里都有各种进步分子的集团。在八十年代中，由于州议会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对联邦创制的计划的控制，为黑人、西语裔、穷人利益讲话的游说集团就会越来越多地把他们的活动从财政上陷于瘫痪的全国政府那里转移到州议会去。而且在州议会里，妇女的力量开始增强。她们的人数增加为三倍，1972年占席位的百分之四·五，十年后增加到百分之十三，现在还在增加，尽管在国会里的人数却几乎毫无增加（参众两院加起来才百分之四·三）。妇女的力量基础主要在州和地方政府里，因此在新联邦主义的体制下比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有更多的实际权力。有些妇女，如俄克拉何马州众议院拨款和预算两个委员会的年轻主席克莱塔·台思拉治已经升到了有实权的职位。虽然妇女州议员一般按政党划分，但是她们在对人的服务问题上往往比较进步，这也许是因为她们对家庭、教育、健康、儿童特别关心的缘故。

至于州长，政治科学家拉里·萨巴托十分恰当地称为“只知玩乐的查理”的那一类州长已明显地销声匿迹了。一直到六十年代末还充斥着州长会议的那种只会拉拉扯扯而思想空虚、行政工作无能的一类州长，已让位于一般比较年轻、比较精明、受过高等教育的经理型行政首脑。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比较出众的有华盛顿州的丹·埃文斯（他是第一个把全国的州长发动起来，在联邦制度问题上成为一支有效力量的人）；密歇根州的威廉·米利肯、加利福尼亚州的杰里·布朗、佛罗里达州的鲁宾·艾斯丘、宾夕法尼亚州的迪克·索恩伯格、马萨诸塞州的迈克尔·达卡基斯、佛蒙特州的理查德·斯内林、佐治亚州的乔治·巴斯比、犹他州的斯科特·马西森、科罗拉多州的理查德·拉姆、俄勒冈州的托姆·麦考尔、爱达荷州的塞西尔·安德鲁斯、纽约州的休·凯里、亚利桑那州的布鲁斯·巴比特。偶尔也有一两个中看不中用的人当上了州长，如象詹姆斯·罗兹，作为领导人，他一无作为，作为政客，却十分狡猾，竟不下四次当选为俄

亥俄州的州长；或者象多尔夫·布里斯科伊，他是七十年代得克萨斯州高高在上、骄横傲慢，然而一无作为的行政首脑。有少数州长不仅不是监狱的监督者，最后反而锒铛入狱，例如田纳西州的雷·布兰顿，他有出售假释权之嫌，而原来是因出售卖酒执照定罪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几十年中最杰出的州长之一，马里兰州长马文·曼德尔最后也身陷囹圄，他是被他那个州的腐化政治风气所害而误入歧途的，要不然他的政绩是满不错的。

在大城市里，六十年代出尽风头的约翰·林赛型的“英雄市长”，到八十年代已经过时。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的那种霸道类型也不复存在。波士顿的凯文·怀特在七十年代末开始仿效戴利的手法结果却弄污了自己本来是洁白的形象。也许最后一个英雄市长是波特兰的尼尔·戈德施米特，他利用联邦援助——和选择时机及分清轻重缓急的巧妙的能力——把他的这个西海岸城市建设成为七十年代美国最进步的一个城市。有几个性格突出的市长，如纽约市的爱德华·柯奇和密尔沃基市的长期连任的亨利·迈耶尔。但是八十年代的主要要求是管理和办企业才能。由于联邦援助大增长的时代已成历史陈迹，各个城市都在努力制止联邦援助的进一步削减，于是重点就转向冷静地进行“收缩”和“少花钱多做事”的能力。比较流行的方法是持续地大力检查开支情况，争取私营企业提供行政人才和参加共同开发工作，同政府职员工会（在八十年代政治气氛改变的情况下，它们已不再是那么吓人了）进行毫不妥协的谈判，有选择地把原先由政府机构做的服务工作承包出去。最熟练地掌握必要的新手腕的大城市市长属于不同的政党、性别、种族，他们中有：克利夫兰的乔治·沃伊诺维奇、底特律的科尔曼·杨、新奥尔良的欧内斯特·莫里阿尔、巴尔的摩的威廉·唐纳德·谢弗、旧金山的黛安·范斯坦、哥伦布的汤姆·穆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威廉·赫德纳特。吸引高技术工业的战略提上了市长们的议事日程，在圣安东尼奥市的亨利·契斯尼罗斯树立了榜样以后，其他市长很可能相继仿效。

城市，郊区，和回到乡下

美国的城市在八十年代初面临问题之多令人束手。大多数城市在前二十年中越来越危险地依赖于华盛顿：成了“靠联邦援助过日子的瘾君子”。八十年代初期，由于主要援助来源中断，各城市都经受了收缩的剧痛。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许多城市的公债信用就猛烈下降，接着是借钱的利率猛增。许多城市拨不出经费供基础建筑的必要保养，形成了危险的局面，这种基础建筑包括街道、桥梁到监狱、上下水道。大多数主要的交通系统已多年失修，不少还承担了过分慷慨的劳工协议。除此之外，还可以加上城区学校情况普遍不佳、非婚生子女和单亲家庭数目剧增，特别是在少数种族集团中间，这就几乎肯定会使退学率、少年犯罪率和社会解体总趋势在未来的年代里必然增长。大多数城市的犯罪率很高，青年失业率尤其惊人，还由于年轻人闲荡无事和生活贫困，滋生了许多人间渣滓，社会关系日趋紧张。

在另一方面，自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一场有力的城市复兴运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心城市比起七十年代末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地方。另一个例证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中心城市办公楼修建热，其对象是大公司的办公处和从法律到金融的专业服务机构。已经有人在谈论将会出现一个完全非集中化的前景，职工可以在家对着电脑终端机工作，很少需要上办公室，果真实现，也属将来相当遥远的事。第二个例证是，改建居民区，蓝领与白领居民区都一样。对许多年轻的专业人员来说，他们在七十年代初期所害怕的和逃避的城市，十年后又成了一个“时髦”的住处。不仅改建中心城市 的房子，还在下城*大

* 上城和下城原指纽约市曼哈顿岛上住宅区集中的该岛上半部分和金融商业机构集中的该岛下半部(以华尔街为中心)，今泛指任何城市中这种住宅区与金融商业区，下城也有直接译为商业区的。——译注

建住宅。而家口较少、手头比较富裕、长期单身或很快离婚的家庭，似乎很可能是今后几年中城市人口的大部。我们发现房地产开发商詹姆斯·劳斯的预言有些夸张，他说：“现在有利于内城的力量在数量上、内容上、力量上都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造成郊区爆炸的力量一样强大。”但是劳斯在波士顿、巴尔的摩、费城和密尔沃基修建“节日市场”的惊人成功，曾经证明不少怀疑派是错了。干得最出色的城市不是那些宣传自己是福利窝的城市，而是宣传自己是复兴、增长、充满希望的地方，是该州经济的关键、金融的中心、旅游的胜地、会议的场所、贸易的口岸，是活跃的艺术和体育的中心、吃吃喝喝和逢场作戏的去处。

有这么许多城市，甚至在极其不利的时候，也不甘心沦为许多“专家”预言必然要变成的“灾区”，这不是偶然的事。在巴尔的摩，在芝加哥，在费城、丹佛和在旧金山，在尼亚加拉瀑布、纽约、罗阿诺克，在达拉斯，在圣迭戈、匹兹堡以及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企业界已经提高了他们同市政府合作的范围和质量，不论是在管理工作的咨询或者在帮助计划、出资、执行大规模公私开发工作方面（往往是公私兼有）。在丹佛，企业界承包“管理”下城新建的只准步行通过的购物中心周围的零售商业街区，并且在自发的基础上致力于内城住房和古迹的保护，同各个内城居民区保持合作性的联系（而不是保持常见的紧张关系）。各大公司为陷入困境的底特律和克利夫兰到态度冷漠的州议会里去游说，赢得了财政上至关重要的让步。到八十年代初期，在保险业和石油业的领导下，有不少公司已经把地方关系纳入公司战略规划的主流。

大公司恢复对城市的关心是件好事，但是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当约翰·根室为写作《美国内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考察美国情况时，他常常能够指明是哪一个或哪几个家族拥有的大公司势力控制着某一城市。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权力已经大大地分散了——分散在企业集团、养老金管理人员、不同的政治

阵营、甚至居民区组织之间。优胜者是民主政体，在俄亥俄州哥伦布这样的城市里最为明显，原先那里受一个家族的统治，使人透不过气来。但是，当大批土生土长的公司出让给联合企业时，城市是付了沉重的代价的。经常的情况是，这种出让不过是大批失业或整个工厂关闭的第一步。同样严重的是，城市失去了关心公益的领导，不论是联合基金、下城复兴、博物馆和会议中心的修建、人力培训计划，还是需要地方各阶层领导的任何计划。城市学家诺顿·朗说，分厂厂长对于他们所在的城市漠不关心，就象“联合水果公司派在一个香蕉共和国的代表”一样。但是那些紧紧地保卫着自己的大公司不致受到外来企业收购的城市，例如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已经表现出非凡的地方力量。

各城市还有一个危险，那就是“特大结构病”，用混凝土、玻璃和钢修建的高楼大厦，不论是用作办公楼还是旅馆，在街上行人看来，都是冷漠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它们高耸入云，与城市原有的气氛和建筑格局格格不入。在象亚特兰大那样的城市，特大建筑抬高了附近地皮的价格，以致在那里出现了一条尽是停车场和色情店的无人（和危险）地段。在七十年代终于开始了一个受人欢迎的反趋势，对于古迹保护等问题开始有人关心起来，同时美国城市的传统式广场、街道、建筑、居民区也重新得到了重视。比如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各城市的码头地区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得到这么细致和专注的关心，而在这以前，这些地方长期以来都尽是一些工厂和分租住房、弃置的铁路支线和腐朽的码头。到八十年代初期，码头地区有了一定程度的修复，改造成了漂亮的零售和餐馆区，还兴建了会议中心、游艇停泊处、滨河公园、步行道——要是在十年以前，人们就会认为这纯属梦想。码头地区修复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孟菲斯和波士顿、西雅图和萨凡纳、两个波特兰（缅因州的和俄勒冈州的）这些分布很广的城市。

城市的另一个进步是七十年代初期席卷城市各个居民区的自助运动。在象圣路易斯的杰夫·范德罗黑人区、纽瓦克的艾翁庞德

葡萄牙裔区、芝加哥的伍德朗地区、巴尔的摩的 SECO（东南居民组织）地区、辛辛那提的奥本山、克利夫兰的布克埃和孟菲斯的格林劳地区，甚至在一片荒凉的南布朗克斯那样的地方，已经传来了新的信息：通过合作自助而组织起来的居民区能够对当地居民的安全、住房、就业、健康和自尊发生有效的影响。什么地方开发公司，什么邻里公民安全巡逻队，什么劳力入股的住房计划，什么花园和能源保养实验，都如雨后春笋一样兴起，令人意想不到。有些工作得到联邦的捐赠，因此八十年代初当这种经费遭到削减时，这些工作就受到了影响。但是那些力量大的团体却找到了办法，它们同企业界、教会、大学、古迹保护组织等结成了有价值的新的同盟，仍然很有发展。

很容易感叹的是没有“足够的”坚强的自助组织。这种团体的一个明显的必要条件是坚强的领导，不是每一个居民区都是这样幸运的。但是我们发现自助运动在美国全境肯定是在发展，这是全国传播界所没有了解到的，不仅是在城市里，而且也在郊区和乡村，只是程度稍差而已，但同样可以察觉得出。在美国最富裕的年代里，美国全国迅速而且危险地滋生了一种自私自利的政治和应享权利的心理——即“这是欠我的”综合症。对此，自助运动是一副很好的解毒剂。在财政拮据的时候，在公共财富缩小而不是增长的时候，在经济可能发生崩溃或能源可能出现短缺的时候，自助运动对美国社会来说，不仅是一种希望，而且是一种可能的解救办法。它的直接盟友是全市或全州范围的能源保护计划（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波特兰、西雅图、加利福尼亚州是主要的榜样），也是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在发生资源短缺和公民强制减税的时候，地方政府领袖必须是有企业家精神的坚强的经理人员。

不管居民区或者城市要想为自己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不可能模糊它们所面临的困难的现实。1980年的全国普查第一次发现，城市里受到贫穷打击的人比农村地区为多。蓝领和白领的中